

现实和文本记忆中的拉铁摩尔*

——兼读《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

姜利标

每当回溯西方汉学的研究传统时，国内学术界总能熟悉地提及史景迁、费正清、孔飞力、杜赞奇、裴宜理等人，然而也正是在不经意之间，总是会遗憾地疏忽掉一位“可以比肩费正清的西方汉学研究者拉铁摩尔”^①（张世明，2011）。其实，拉铁摩尔在研究中国方面不仅具有独到性的见解和体系化的思想，还具有那些汉学家所不具有的独特性学术特质。但在历史浮沉的过程中，拉氏却受到冷落并淡出了中国研究的视野。

一、被现实遗忘的“汉学他者”

拉铁摩尔人生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并在这里生活了近30多年。这种长时段的人生阅历，在西方汉学研究者中绝对独一无二。当然强调这点并不是说，要进行中国研究就非得去中国或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也不是要忘却“康德从未走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话语生产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实践机制研究”（16YJC840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当学术界将“致力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之久”的费正清视为著名汉学家时，殊不知1929年之前的费正清还不具备掌握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的历史能力。随后两年，费正清逐渐对现代中国历史以及相关问题比较感兴趣，并于1931年读博时明确以“中美关系发展史”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而此时的拉铁摩尔却已公开发行了几部研究中国的著作，如《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1928）、《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等，并获得一定的海内外学术声誉。1932年，费正清来华学习时，曾亲自拜访此时身在中国的拉铁摩尔并向他咨询“中外约章以及海关史方面”的资料（矶野富士子，1999）。然后，费氏个人正式出版且被誉为“美国中国学研究圣经”的第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1948），也广泛借鉴了包括拉氏在内的美国新近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可见“拉氏对费正清的汉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余英时，1993）。此外，拉氏众多的学术著作也主要是围绕中国历史抑或中国问题而展开的论述，从而将他与受自己影响的费正清相比并不为过。只不过拉氏与费正清在中国研究之间的遗憾在于，他并没有像费氏那样组建一个稳定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及培养相应的学术性弟子。

出小镇但仍建构出现代哲学体系”的励志事实，而是注重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学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原汁原味的中国研究体验感。正如袁剑所言，“中国成为拉氏年幼时代独特的思想与记忆场所，后来也激发了他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边疆地区的兴趣与动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他自己对于中国边疆和边疆问题的独特理解，并将边疆地区作为构建自身历史观和地缘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袁剑，2016：3）。正因为拉铁摩尔将中国视为人生的第二故乡，所以他在中国研究的道路上很少遭遇文化的隔阂或现实的束缚等问题，从而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中，寻找到理性审视中国社会的视角。

由于拥有长时段浸染中国的生活阅历，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地带的分析也显得非常老练和地道。诚如上文所述，史景迁、费正清等或许是西方最熟悉中国的学者，但他们这种熟悉也仅仅是建立在局部了解汉字或中国史料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中国式问题研究。他们经过严格史料筛选过后所形成的学术想象，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学术建构过程中的认识而非具体情境之中真实、客观和生动的现实。不过总的来说，相对于那些不能阅读史料或汉字的其他学者来说，史景迁、费正清等人的中国研究无形之中又让他们格外地充满自信。而对于“不仅学会了汉文，而且学会了北京话、山西话、陕西话和蒙古话，蒙古文俄文也能谈能写能用，甚至还唱的一口好秦腔”（袁剑，2016：26）的拉铁摩尔，间接性地又使史景迁、费正清等学者的中国研究显得并不是那么的地道。在拉氏的那些自由、娴熟的文风表述过程中，我们很难想象和判断它出自一名国外学者之手。从而有时他也不无反讽地批评当时欧美一些所谓的职业汉学家，认为“他们假装看得懂汉字和史料，实则这些工作只不过是借懂得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处理，然后他们润色罢了”（矶野富士子，1996：41—42）。

历史的文本记忆，似乎总是很难让学者置顶在他该出现的学术舞台之上。正是基于历史书写选择性忘却的特性，杜赞奇（2009：47）提倡以一种新的“复线历史书写观”，即“摆脱过去单线历史的呈现方式，强调历史书写过程中散失的多元化资料以及被压抑声音的呈现”。可以说，汉学研究传统中的拉氏，也在某种程度上遭遇书写遗忘的尴尬。当《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在汗牛充栋的汉学研究学术海洋里爬梳出这么一位富于传奇性的西方汉学研究者时，我们在油然而生的惊叹之余，又勾起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疑问，即具有独特学术特质的拉铁摩尔为什么会遭到中国学术界的遗忘？大致来看，历史的书写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顾忌：

第一，拉氏身上折射出难以调和的三重身份关系，致使学术共同体不太愿意过多牵涉到一些本已“有问题、有歧义”的争论之中。首先从国族身份的角度来看，由于拉铁摩尔在中、美、英等地生活过较长时间，譬如“一名美国人”“地道的中国人”“外蒙古人的盟友”以及“英国人的朋友”等，这些超越国别限制的学术抑或生活称谓，在拉氏日常身份的认同过程中不断地被他随意性地有所选择。这些透露浓烈中西方身份标签的学术或生活称谓，却未必适合“二战”后国家意识、思想形态对抗激烈的中国学术环境。其次，从职业身份的角度来看，尽管拉铁摩尔更愿意外界将他视为一名对边疆颇有研究的学者，可他的人生职业经历却又浸染着“政客”（梁元生，1994）的气息。这不仅表现在他学术旨趣所涉及的政治关切层面，而且还突出地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职业经历上。由于拉氏对当时局势进行客观、独到的预判，赢得了美国政治当局的信任，从而被罗斯福总统推荐并成为蒋介石政府的私人政治顾问。不过，拉氏饱满的政治热情并未如鱼得水般地得到释放。反而这位“顾而不问”的学者对政治现象感到“困惑、苦恼和无奈”（袁剑，2016：90），某种程度上间接地弱化了他当时做出的政客选择，导致他出现有心“以政治为业”又不得不转向“以学术为业”的现实尴尬。最后，在政党身份以及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上，拉铁摩尔的一生也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还没有跨入学术生涯时期，拉氏仅仅作为一名生意人或旅行者的角色而出现，此时他于政党的宗旨、路线以及施政方针等压根不感兴趣。随着行走于边疆区域以及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氏对待政党的立场开始显得飘忽不定甚至扑朔迷离。他既同情落后地区或者民族国家的苦难，也痴恋发达区域或者丰裕国家的现状，从而产生游离不定的双重价值观。譬如，拉铁摩尔在受到美国国内左右派共同肯定的同时，却又在国内遭遇到政治性迫害；拉铁摩尔在中国既受到国民党的礼待，又受到共产党的礼遇；拉铁摩尔既为美国的利益代言，又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出谋划策。这些似乎都在表明，拉铁摩尔虽然在现实的生活中有政治的奋斗理念，但无明确、始终如一的政党身份认同。也正因为他在思想上的过于纯粹，从而没有避开政治利益集团莫须有的“间谍麻烦”。总之，拉氏的一生似乎都处在身份情境认同的困扰之中，从而很难引起国内学术共同体对“这位看似没有立场的汉学研究者”产生兴趣。

第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秩序。对于那些扰乱国家秩序的破坏分子、威胁中国边疆的敌人，新政权坚决采取强硬的斗争方式，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秩序稳定以及领土完整。“之前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所导致的边疆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中国国内的内部发展问题”（袁剑，2016：2）。此外，新政权还改变了自晚清以降国家应对社会变革时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局面，有效地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恢复社会生产、发展民生经济”的道路中来。与此同时，新政权也一改传统“寄托依赖”的国家生存政制，主张“和平共处”的外交友好睦邻政策，并承诺绝不奉行大国欺压性霸权，从而逐渐赢得了周边邻国以及世界的信任。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秩序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在随后很长的一段社会建设时期并不再需要关注“如何理解中国的边疆问题”。另外，新政权在建设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政治意识形态东西方对立的波动，作为西方人物的拉铁摩尔也难免被划进学术思想讨论的禁区。总的来说，新政权建立之后所确立的国家发展方针，使得专注边疆区位历史以及边疆冲突主题的西方学者拉铁摩尔，淡出了当时国内学术界的视野。

第三，从中国研究的汉学传统来看，拉氏平庸的文本风格难以受到后来学术共同体的青睐。如果说史景迁和孔飞力等开创了在中国研究叙事风格的话，那么裴宜理、杜赞奇等确立的是另外一种严谨的史学学术风格；当然在广义的中国研究传统中，还存在类似马可·波罗、赫定等人所遗留下来的不太带有学术味道的趣味游记性风格。其中不论是学术性的叙事、严谨的史学还是趣味、游记性风格，它们都可以作为一种“理想范例”供后来研究者通过某种方式去模仿，甚至习得文本的写作方法精华，从而受到学术共同体更多的关注。由于拉铁摩尔既浸染非学术性的游记风格，又“半道出家”进修了严谨的学术风格，从而难免让他自身的文本风格特点并不是突出。拉氏所要做的不是“20年代美国年轻人那种时髦的游记式书写，而是综合了游历体验与前期阅读之后的自我总结”（袁剑，2016：103）。这种夹杂的学术风格，让他原本比较严谨的《满州：冲突的摇篮》一书显得过于“频繁地使用生僻、语义不详的概念和词”，从而犯下“生搬硬套”的学术禁忌（毛里和子，1983），更别说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文本。所以说单纯从文本风格的形式讲，拉氏的这种既不受学术共同体青睐又不受非学术共同体青睐的文本风格，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相应的忽视。

总而言之，拉氏的身份定位问题，让学术共同体不愿过多地牵扯进对他无意义的学术争议之中；当时的国内社会环境又让拉氏的边疆研究方式，暂时性地淡出了学术界的关注议题；没有特点的平庸文本风格，又受到学术共同体的某种程度上的忽视，从而让我们对拉铁摩尔甚至其思想越来越陌生。

二、徒步认知的中国边疆话语

拉铁摩尔自20世纪20年代始,就已不断地游历于内蒙古、新疆、苏联、中亚等地,然后他将这段经历整理成书以《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进行了公开发表。这部著作的出版,激起了拉氏对中国边疆的浓厚兴趣且打开了他的学术研究之门。拉氏后期的学术经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仍在延续这场实践认知的兴趣。然而他最具魅力的学术赞赏,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特性:其一,拉氏在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他所研究到的中国每一寸边疆;其二,对自己所到过的边疆区域进行创造性分析,并形成属于自己的汉学研究话语。其中,拉氏的实践方式是他边疆知识生成的基础,而边疆知识的生成则构成他实践经历得以存在的要件。

如果严格追溯拉氏学术生涯起点的话,他在哈佛经历学术进修之后,于1929年至1930年的东北考察无疑最具说服力。拉氏的东北之行与先前的内蒙古、新疆之行有着根本的不同。1929年之前的考察,更多的是带着旅游涉猎心理在领略中国边疆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而东北之行则开始明确带有“现实的田野目标和学术上的关怀取向”。这时候的他,“不仅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更清楚自己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袁剑,2016:104—105)。因此,拉氏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研究起点区域在东北。在东北为期长达九个月的田野考察过程中,拉氏收集到了大量关于当地的地理民情、习俗传说以及老人回忆录等材料,从而为后续写作《满州:冲突的摇篮》、《满州的蒙古人》等,做好了充足的知识储备。

拉氏的东北之行是一场“地方史与全球史相互交织的审视”,这时期他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比较视角的理念引入上”(袁剑,2016:107)。对于这点的理解,可能当前的中国研究俨然熟悉了比较法的理念;但对于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研究而言,拉氏的尝试不得不说是一种方法理念的突破。他不仅为具体区域的考察提供“中国—日本—俄国”“汉人—满人—蒙人”“东方—西方”等直观分析的类型框架,而且还为深层“理解地方文化背后所从属的文明观念”提供了切口。拉铁摩尔认为,东北拥有比较明显的平原、过渡带以及草原区域,从而注定是“多种文化交汇和冲突的战场”(Lattimore,1932)。对于如何理解这块中国历史独特的区域,拉铁摩尔创造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贮存地”以及一个根本性的假设,即“东北这块区域就是蕴含各种角斗力量的贮存地和冲突场”(Lattimore,

1932: 36—42)。在核心概念和根本性观点的基础之上,拉氏从历史比较的视角展开了对这一区域的具体分析,并结合东北边疆当时所存在的中、日、俄三方竞争性力量进行展望且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凝聚在一起,就在于其背后成熟的民族文化”(Lattimore, 1932)。费正清对拉氏的观点简明扼要地评论道,“拉氏对东北部边疆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即它是非汉族政权盛衰兴亡的贮存地,拉氏也是地缘政治学方面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费正清, 1993: 54)。

当拉铁摩尔在东北调查时,他也留意到东北区域存在大量的蒙古族人,从而这种独特现象勾起了他试图理解“蒙古族人和蒙古族社会”的想法。可以说,拉氏对东北蒙古族人和蒙古族社会的认知,助推了他随后的内蒙古边疆研究。“东北的蒙古之缘让拉氏的视野更加宽广,甚至拓展了他对欧亚内陆的认知”(袁剑, 2016: 121)。因此,内蒙古区域也就成为拉铁摩尔研究中国边疆区域最典型的一部分。在对内蒙古区域研究的过程中,拉铁摩尔的认知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换。自20世纪30年代末至“二战”爆发期间,他的视角重心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区域即“与长城以北相毗邻的区域”;所处理的核心议题大致来说就是,“长城以北流动性很强的草原游牧型社会”如何对“定居性很强的中原种植型社会”构成威胁(拉铁摩尔, 2005)。

拉氏通过相关史实资料以及民俗风情的考察发现,其实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同期性的历史互动过程之中,即它们各自会跟随社会情境的变化而相互影响、渗透甚至形塑。拉氏发现,这点尤其表现在“长城南北有限距离范围的居民生活方式上”。当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势力强于南方中原势力时,长城南边有限距离的居民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反之,当南方势力强于北方势力时,南方居民的生活方式会拓展到长城北边的有限距离上。当然,如果南北势力均衡时,这时长城南北有限距离的居民生活方式就保持着混合风格的形态。实际上,拉氏对“长城以北相毗邻区域”的考察,仍在延续解释东北时所创造的“贮存地理念”,即将“长城南北有限距离的区域”视为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交互影响的观测性变量,进而通过它来反映该区域冲突力量的强弱对比融合问题。

如果说拉氏起初研究蒙古区域时主要将精力置放在长城沿线的话,那么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国际格局变化,又触发他将整个蒙古区域尤其是新独立的外蒙古区域纳进关注的视野。这块联结苏联和中国的游牧型国家未来到底该如何

发展，似乎成了拉氏此时最为关切的问题。拉氏在随后的蒙古区域研究中高度关注夹在中俄之间的外蒙古，即考虑它如何发展成为一支独立性的民族力量。正因为拉氏后期蒙古边疆策略的转移，也为他增添了“蒙古国外籍院士”的荣誉。从客观角度审视拉氏的蒙古区域研究时会发现，他后期研究已不再仅仅关注民族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变迁等，也不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优越文明姿态来审视这一区域，反而更多地站在外蒙古的立场上，以“外蒙古人的盟友”身份来考虑后发展国家的成长问题。他在先前两大社会形态冲突力量对比融合的解释过程中，进一步将思考重心由区域文化冲突转向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即置放在“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的不兼容必然会导致土地资源分配争夺”的假设之下进行深化认识。拉氏认为，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在“固定性—移动性”的经济生活张力之中，不断地循环和重演民族边界线的分割和联合运动。实际上，拉氏对蒙古区域发展所揭示出来的“中国农耕—游牧结构竞争关系视角”，开创了西方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袁剑，2016：136）。

在对蒙古区域进行解释时，拉氏也对中国新疆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其中的缘由，拉氏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一方面，他想细致了解因陆运商业勃兴而带来的新疆发展史；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当时新疆于中国领土防御的重要性以及边疆危机的紧迫性（拉铁摩尔，1973）。在对新疆具体考察的过程中，拉氏结合自己先前对东北和内蒙古区域的认知观点，提出了以下四条重要的论断：

第一，新疆是一种内外部结构性竞争力量互动发展的复线新疆，而不是自身力量独自发展的新疆，因此它的发展路径与东北或内蒙古区域有所不同。在这点的基础之上，拉氏进而提出“主体绿洲”和“次级绿洲”概念，并分析新疆内部两种绿洲层次之间的纵横向互动、发展和转化问题；第二，拉氏认为，新疆自汉唐时期就已发展成为中国的领土，它是建立在中国无比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威信统治之下；第三，近代强大的西方势力入侵，使中国原先比较明朗的新疆边界线纷扰不断；第四，拉氏认为新疆应被视为亚洲的枢纽。这种认知定位突破了传统“西北舆地学以及在中国自身内部认识新疆”的限制，从而在一种更加宽广的地缘政治意义上将新疆拉回到亚欧大陆的中心，使“新疆成为内亚地缘政治研究的焦点”（许建英，2011）。实际上也正是基于这点，拉氏解释和回应了当时的新疆为什么处于“较为紧迫的发展现实之中”（袁剑，2016：158）。总之，拉氏进一步延续先前“草原社会和农耕社会之间的互动”观点，并从结构性社会互动的内外部两个层面详细审视了该区域

的社会生态。

当然，中国的边疆界限远不只是拉氏所论述到的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区域，实际上西南也是一块重要的区域。对于这块区域，拉氏有心但并没有去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其实拉氏当初在被蒋介石聘请为海外顾问时，就曾试图撰文分析中国西南区域的穆斯林文化问题。拉氏假想道，“如果中国北方的穆斯林文化是从路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话，那么西南区域的穆斯林文化有可能是从中东海上海贸易进入到中国的最南端”（袁剑，2016：169）。遗憾的是，拉氏在抗日战争之后离开了中国，然后再也没有重拾对这一问题以及该边疆区域的研究。这也难免成为我们当前认识拉铁摩尔学术思想轨迹的一种期待性遗憾。不过，这种现实并不影响拉氏关于东北、内蒙古以及新疆区域的论述，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拉氏实践丈量基础之上所创造出来的中国研究先驱性认识。

三、考古学意义下^①的知识解析

由于国内目前还没有系统研究拉铁摩尔的文本，《边疆的背影》对这位中国研究先驱性人物的解读，无疑具有“重新发现的新起点意义”（成崇德，2016：4）。《边疆的背影》不仅从史学传记的视角为我们勾勒了拉氏的个体生命历程，而且还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角分析了拉氏的学术思想。它不仅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肉身存在的拉铁摩尔”，而且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具有时代思想意义的拉铁摩尔”。大致来说，《边疆的背影》对拉铁摩尔的研究，所折射出来的文本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面对拉氏众多著作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时，《边疆的背影》试图以“空间”为切口，进而在“生活空间”和“学术空间”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一幅立体式的拉氏肖像。由于目前中国学术界在研读拉铁摩尔时，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拉氏“片段性的人生经历”（胡垒，2006；后文丽，2015）或“有代表性的

^① 由于拉铁摩尔已于1989年去世，从而以他本人或文本为研究对象时，需要我们不断地回溯历史，甚至考证、整理和探究相应的文本，才能再现真实的拉氏以及他的思想。这种研究类似考古学对文物考察之后所形成的知识，因此借用“考古学”一词，以对《边疆的背影》所形成的研究性成果进行方法性的隐喻。

学术思想”（章永俊，2006；黄达远，2013）观点之中，从而这种局部实用性的解读方式，很难让拉氏进入大众的视野。这对一位拥有成就的汉学研究者来说，未免不是一种历史性的遗憾。其实我们透过《边疆的背影》的研究可以发现，不论对拉氏的人生经历呈现，还是对拉氏研究主题的勾勒层面上，“空间”已然成为该书甚至拉氏学术思想的一条重要隐形线索。如果说文本安排中的北京、延安和重庆算是拉氏人生中最值得铭记、最有故事性的生活空间的话，那么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则属于拉氏人生之中最难忘的主题性或学术性空间。这种以空间为叙述线索的人物思想解读方式，不失为拉氏学术人生再现的一种有意义性的尝试。

第二，《边疆的背影》采取“还原性解读”与“辐散性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本身的在场意义进行了重新审视。当前学术界对拉氏的思想解读，无外乎存在着两种流行的方式：其一，线性地再现拉氏原汁原味的思想；其二，无限制地拔高拉氏的思想。虽然不论是前者的还原性解读还是后者的辐散性解读，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认可拉氏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但这两种解读方式仍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倾向缺陷。其中，还原性解读过多地追求拉氏到底是“如何说、怎么说”的原谓层面，而并没有留意拉氏“为什么这么说”的深层意谓蕴含，最终演化为成只尊重事实而不评论事实的结果；辐散性解读则沉浸在过多地泛化拉氏本身的思想意义层面，从而弱化、模糊甚至脱离了思想的本身，最终演化成是不是拉氏所论述的观点，都值得商榷。简单来说就是，还原性解读在秉持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之上抛弃了一切不相关的枝节，而辐散性解读则在建构性原则的基础之上任意发挥知识本身的效用。其实任何一种过度的解读方式都无法呈现出真实的拉氏思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接近拉氏思想的本身。

虽然《边疆的背影》主体部分是在保持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再完整地按照拉氏的思想进行还原，但每当涉及到这些思想生成的过程时，时代的背景、知识的渊源以及话语的意义等，都会自觉地构成了文本所图绘拉氏形象的建构性串联脚本。譬如，在对拉氏的东北边疆研究陈述时，文本先介绍拉氏在东北调查的生活轮廓，然后再叙述拉氏的学术思想，最后从地方视野和现代性的角度进行评论。可以说，不论是拉氏的“生活空间”抑或“学术空间”的印迹，我们都能透过文本肌理感受到还原性解读和辐散性解读相结合的分析理念，从而最大化地摒弃非此即彼的过度评述拉铁摩尔的弊端。

第三，在文本意义的自我指涉层面上，《边疆的背影》也能唤起学术共同体对

拉氏思想的注意，尤其是拉氏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中国边疆分析范式研究”（黄达远，2015）。在当前中国“一带一路”的新倡议以及边疆区域发展性危机的层面上，现实不仅需要我们寻找到切合时代发展的思想，而且还需要我们延续已有的边疆知识魅力。无疑在这点上，《边疆的背影》给我们展示的拉铁摩尔正是这样的一位具有启发性思想的人物。其实透过拉铁摩尔与费正清和施坚雅等的比较，我们至少可以明晰两个基本的学术理念：其一，拉氏是一位比汉学研究创始人费正清还早的西方学者，而且他的中国研究成果丝毫不亚于费正清以及随后的学者；其二，拉氏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分析范式即“内亚范式”（如下表），从而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施坚雅的市场分析范式、弗里德曼的宗族分析范式、杜赞奇的文化分析范式以及史景迁或孔飞力的文本分析范式等，共同构成分析中国现实抑或中国问题的方案性选择。

表 拉铁摩尔的内亚分析范式

内亚范式的要素	指涉内容
分析的单位	聚焦于东北、内蒙古、新疆以及外蒙古区域
分析的起点	田野环境中的文化、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
分析的框架	农耕—游牧社会结构下的竞争性互动关系
分析的模式	“中国/内部—西方/外部”的复线发展模式
分析的核心概念	边疆、草原—中原社会、财富—移动性等

在这种范式分析中，拉氏的“内亚”具体指，“一块水流无法抵达海洋的心脏地带。它位于西部的里海和东部的满州（东北）之间，并涵盖背部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及南部的伊朗、阿富汗、印巴边界地区的群山、青藏高原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带”（袁剑，2013）。不过具体指涉到中国研究时，拉氏分析的单位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带，其中尤其聚焦在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区域；这种范式分析的起点为具体田野环境中的文化、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即将地方社会的文化、生态作为研究的起点；它的分析框架为“农耕—游牧社会结构”下的竞争性互动关系；它的分析模式不是如柯文所说的中国研究中的“冲击—回应、传统—近代以及帝国主义”（柯文，2002）三种纯粹的理念模式，而是属于拉氏独特的“中国（内部）—西方（外部）”的复线发展模式；范式分析的核心概念，也不是诸如“市场”“经纪人”或“宗族”等，而是“边疆”“草原—中原社会”以及

在此基础形成的“财富—移动性”等社会发展特征。正是因为拉氏在分析中国边疆时，不论在研究的单位、起点、框架、模式以及概念等，还是在研究的观点、话语以及体系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分析类型，从而支撑起了属于他所创造的分析模式。

总的来说，《边疆的背影》紧紧围绕空间视角为切口，从拉氏一生之中的“生活空间”和“学术空间”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拉氏形象。这种建立在客观还原和主观建构基础之上的拉铁摩尔，并不是一位没有任何学术思想生命力的拉铁摩尔，相反而是一位充满时代契合感以及富于启发性的思想家，尤其他的内亚分析方法，为我们开启了一种新的审视中国边疆范式。

四、结语：扩展性的再认识

作为20世纪经历最丰富曲折且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汉学研究者，精通汉、蒙、俄、英等多种语言的拉铁摩尔，由于历史、社会以及自身的原因最终还是淡出了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拉氏已离我们远去，但拉氏的思想诚如张世明所言，“作者已死，却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和他思想更自由的交往空间”（张世明，2011）。其实，《边疆的背影》也可以看成是对拉氏思想自由发挥的解读性产物。虽然它试图在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基础之上，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存在的肉身拉铁摩尔”，与此同时也试图描绘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拉铁摩尔”，但拉氏之所以淡出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甚至淡出西方汉学家的荣誉行列，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凭借“简单的文本再现抑或思想打捞”（袁剑，2016）等手段，就可以挽回期待性的结果。诚如上文所述，“拉氏身份的定位、时代情境的变迁以及文本风格的平庸特性”，都构成了拉氏被遗忘的原因。此外，当《边疆的背影》将探究的重心置放在重构拉氏正面立体化的形象上时，串联的文本逻辑难免会从肯定性角度进行相应的素材组织，这也导致我们难以在《边疆的背影》里看到消极的拉氏形象评价。

在文本的评述问题上，帕特里克·贝尔特（2005：7）认为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倾向，即“透视法倾向”和“外在论倾向”。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坚信每个理论都具有自身论证的合理性，从而在评议时较侧重于理论思想自身的“内在逻辑自治性”；而后者较倚重于从文本以外、作者没有涉及到的主题来“评价它的价值和意

义”。实际上，不论是从透视法倾向还是外在论倾向来看，《边疆的背影》对拉氏形象的重构，无疑还是存有客观认知的遗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扩展性认知的遗憾。首先，从透视法的内在逻辑自洽性而言，拉氏的边疆研究只能算是“区域史方法研究”（黄达远，2015），而不能算是系统化的边疆理论研究。虽然有学者试图在拉氏的思想基础之上，将他的研究解读成为“内亚分析范式”摹本（袁剑，2014），但拉氏在有生之年并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系统化学术努力。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拉氏确实徒步考察过中国东北、内蒙古以及新疆等区域并建构出相应的创造性解释知识，但如果因为这种事实非要将拉氏的思想系统化，那么任何有深度的内在逻辑解析都只会成为一种“自由逻辑的想象”。其次，从文本以外的视角来看拉氏思想的话，其实中国的边疆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北部区域，相反南部区域的广西、云南和西藏等地，也时刻隐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和利益冲突；与此同时，21世纪中国的南部海域边疆，更是拉氏关注中国边疆研究的“盲点区域之一”。但不管怎么样，诚如贝尔特所述，如果评议者一味盯着作者能力之外的主题且进行无限制放大遗憾的话，实际上这种方式已经超出了应有的讨论范畴，从而最终步入“自我预设的评论立场陷阱里”（贝尔特，2005）。

概而言之，作为一位关注中国现实的研究者，拉铁摩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就中国的边疆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创造性解释，这是他不应被学术共同体遗忘的学术性贡献。此外，在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拉氏所关注到的内亚社会历史文化形态，依然可视为中国发展布局的参考性常识。因此，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边疆危机以及边疆发展的时代格局之下，甚至在拉铁摩尔自身学术思想的魅力基础之下，重新再现、对话抑或延续拉氏的学术价值，无疑对中国的边疆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贝尔特，帕特里克，2005，《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成崇德，2016，《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序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杜赞奇，2009，《从民族国家挽救历史》，王宪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后文丽，2015，《欧文·拉铁摩尔蒙古纪行概述》，《黑龙江史志》第3期。
- 胡垒，2006，《拉铁摩尔：见证中美数十年风云》，《中华新闻报》1月18日。
- 黄达远，2013，《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例》，《学术月刊》第6期。

- , 2015, 《“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东西轴线: 兼对拉铁摩尔“区域研究法”的探讨与应用》,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6期。
- 矶野富士子, 1996,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吴心伯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柯文, 2002, 《在中国发现历史》, 林同奇译, 北京: 中华书局。
- 拉铁摩尔, 1973, 《西域和内蒙古之行: 我度过青春的地方》, 《参考消息》2月4—5日。
- , 2005,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唐晓峰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梁元生, 1994, 《学者、政客与“间谍”: 拉铁摩尔(1900—1989)》, 《民国档案》第2期。
- 毛里和子, 1983, 《论拉铁摩尔》,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许建英, 2011, 《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
- 余英时, 1993,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 付伟动等主编, 《西方汉学家论中国》, 台北: 正中书局。
- 袁剑, 2013, 《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 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 《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
- , 2014,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 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与互通》,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12期。
- , 2016, 《边疆的背影: 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世明, 2011, 《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 《史林》第6期。
- 章永俊, 2006, 《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第2期。
- Lattimore, Owen, 1932,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作者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刘海霞